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特征

蔡 禾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帕累托、腾尼斯等一大批卓有成就、颇有影响的社会学家活跃在这一领域里,尽管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仍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19世纪中叶社会学创立阶段孔德(法国)、斯宾塞(英国)等人的社会学特征,而且影响到20世纪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特征,是在学科性质上对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进行反省,重新确定社会学的学科对象。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提出是在19世纪40年代左右,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与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并无清晰的界限。在孔德那里,社会学被视为对其它社会科学有指导意义的“抽象科学”;在斯宾塞那里,社会学几乎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体系。社会学从诞生到19世纪末约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尽管学科队伍有了发展,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得到承认,这不能说与以上原因无关。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理论所做的贡献都是以对学科性质的反省为前提的。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以往的社会学“仍然依附于与它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学说,”^①人们仍然“习惯于用哲学思想模式来看待社会学的事情。”^②但是,“只用一般的哲学推论,就无从进行社会学研究,”^③因为,社会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哲学的一门“参考科学”。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批评那种力图把社会学建成关于人类一切事物的、包罗万象的学科的作法是“徒劳无益”的,只会“一事无成”。社会学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学科对象。正是在这种反省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放弃了那种笼统地把“社会”规定为社会学的学科对象的作法,也不再把构造一个关于社会的总体理论作为己任,而是强调社会学的经验性质,纷纷从某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出发来定义社会学,并以此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过程和结果的科学,并以此出发构造了他关于宗教、科层制、权威统治的理论。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产生制约力的“社会事实”的科学,并以此出发形成了他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当然,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并没就社会学的学科对象达成共识,但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最终摆脱哲学的思辨,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并在大学和学院中得到正式的承认,从而为社会学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学研究立场上的反自然主义倾向的出现,有人把这种倾向称为人本主义。19世纪上半叶,当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陷

入危机时，自然科学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得当时的西方社会成为一个对自然科学心驰神往的社会，许多社会科学家寄希望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就来研究社会，走出理论的危机，这中间包括孔德、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家。因此，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社会学理论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即认为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一样，存在着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社会现象；主张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理论范畴和理论框架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这种自然主义倾向实际上是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为基础的。19世纪下半叶，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动摇了牛顿物理学，这必然冲击到社会学中的自然主义。既然自然科学本身的真理性都值得怀疑，那么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学理论就更值得考虑了。虽然在这一时期，仍然有迪尔凯姆、腾尼斯(德国)等社会学家坚持传统的自然主义立场，但以韦伯为代表的反自然主义立场形成起来并与之对恃。这种反自然主义的研究立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是有本质差别的。在自然领域中，一切现象都是无意识的，而在社会领域中，人总是赋予行动以一定的意义。第二，在社会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人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社会不过是人的派生物，不具有实在的意义。第三，人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学的学科对象普遍联系起来，尤其是行动中的动机、意义、心理过程受到普遍关注。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对行动者主观方面的“理解”和“解释”，即通过一种近似移情的联系去解释社会行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学家中，迪尔凯姆是比较忠实地继承了孔德等人的自然主义立场的，但细究起来，他的自然主义与孔德的自然主义仍然有些区别。他所讲的外在于人、并对人产生制约力的“社会事实”，实际上仍是从人的相互行为中产生，其制约力也只有通过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内化于个人才会发挥影响。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对恃直接影响了后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方法论上从侧重于进化论转变为侧重于功能论。方法论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它的认识根源的，即对以前进化论中单因直线发展观的批评，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与历史时代的变化相联系的。西方社会学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还处在建立和巩固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的阶级。所以，他们极力想通过对社会进化规律的阐述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作出论证。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学家则生活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阶级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资产阶级也正在从一个进步的阶级转变为保守、反动的阶级。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来讲，首要的任务不再是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作进化论上的论证，而是要通过功能分析对现存的各种资本主义现象作“合理性”说明，并寻找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与整合作用。方法论上的转变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的：第一，进化论观点包含着对分析对象作出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习惯于把一切现象都放在进化阶梯上加以分析。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价值中立”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倡导的原则，他们主张只对分析对象作客观的、“是什么”的描述，而不作“怎么样”的价值评价。换句话说，社会学只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别与变化，而不是把这些差别与变化放在进化的阶梯上加以比较。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行为与非合理性行为，并认为存在着一个从非合理性向合理性变化的趋势，但同时他也声称，合理性只是一个“纯理型”的、与价值无涉的分析概念，在现实中，合理性“可能好也可能坏”，作出这个判断不是社会学家的任务。第二，这一时期的一些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帕累托(意大

利), 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体系的观点出发, 认为每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 必定是它对其它现象或整体具有功能。“因为一种绝对无效用而存在的事物意味着对社会来说是无用的、多余的。如果社会的普遍现象都是寄生性质的、于社会无益的事物, 那么社会组织的预算就根本靠不住, 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④ 所以, “解释社会现象, 只找出它所依附的原因还不够, 必须进一步把这种现象所以能够协合一致的功能找出来。”^⑤ 第三, 功能分析方法并不是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但作为一种与因果分析并列的社会学方法被明确提出是这一时期的事情。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社会学家看来, 一事物产生的原因与该事物的功能是不同的, 在解释社会现象时, 必须分别研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功能可能包含原因, 但原因不能包含功能, 所以, 只有通过独立的功能分析方法, 才能“弄清楚和明确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机体与它的需要之间, 究竟有没有相适应的地方。”^⑥ 从而发现它存在的效用。更有甚者, 帕累托还提出社会学应该用功能分析代替因果分析, 社会学只应注意“社会中起作用的一切因素, 并在这些因素间建立起经常的依赖关系。”^⑦ 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方法论上的转变, 标志着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中革命性的丧失, 它直接为20世纪中叶占据霸主地位的功能论这一具有明显保守性质的理论的产生, 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前提和理论上的渊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四个特征, 是注重观念体系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作用。面对帝国主义阶段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危机, 西方社会学家都努力寻找能使社会整合起来并协调发展的要素, 但作为资产阶级学者, 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 而是把注意力普遍地投向了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 许多社会学家都把价值、道德、伦理、情感等主观意识方面的东西看作是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 是把社会结构中各种要素结合起来的关键。迪尔凯姆把社会整合规定为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 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 没有这个基础, 社会秩序就无法保证。滕尼斯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形态, 就在于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共同意识”不同。用他的话来说, “在更狭窄及更严格意义上所谓的社会生活只能从共同意识即相互的肯定中推导出来。”^⑧ 由于他们把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的基础, 所以在解释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时, 往往把原因归结为观念体系的功能失调, 即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有的观念体系, 还没能马上建立起与之相应的观念体系, 因而社会容易陷入混乱和失范。为一个陷入危机的社会寻找出路时, 最关键的就是帮助重整处于混乱状态的观念体系, 甚至重建宗教。迪尔凯姆就曾这样说过, “社会生活在其每一个方面, 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 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⑨ 这种强调宗教精神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功能作用的想法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能看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五个特征,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再象孔德、斯宾塞等早期社会学家那样乐观, 而是反映出一种矛盾的发展观。一方面, 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性给予肯定; 另一方面, 他们又觉察到这种发展并不象斯宾塞所说的“最符合人性。”韦伯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 肯定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是不断地合理化,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行为、法理权威、科层制都是合理化的产物, 没有这些, 就没有效率和秩序。但他又指出, 这种合理性需要人们付出感情和精神的代价。在科层制中, 过去那种有助于赋予生活以目的和意义的个人之间的联系被非私人关系取代, 对自发情感的满足和欢乐被系统地服从科层制狭窄的专业要求淹没, 个人不再是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个体。这种两难的困境在齐美尔的文化观中也可以看到。齐美尔认为, 人类为了获得自由, 创造了大量的文化形

式和内容，但这些文化一经产生又会成为某种异己的东西对立于人，人们要获得自由、参与社会生活就要接受这些文化，而一旦这些文化被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就会对人的创造性产生限制，人更会在为争取自由创造的文化中失去独立性。这种矛盾的发展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找不到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和摆脱矛盾的出路，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渗透着一种悲观情绪。比如，腾尼斯认为，只有传统的“公社”型社会才能产生出一种亲密的、互相依赖的共同生活，能使人感到与所在整体处于一种亲切熟悉的状态，不觉得在其中丧失自身。而现代“社会”型社会则表现为某种相互陌生的生活组织，人与人的关系是疏远的，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帕累托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种悲观情绪，他说：“我没有任何处方能治愈资产阶级或者说整个社会所患的疾病。……我是处于这样一位医生的地位，这位医生意识到病人患的是绝症，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救活他。”^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六个特征，是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来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19世纪40年代，当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开始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创建时，马克思恩格斯也以《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光辉著作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广泛传播，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成功。这迫使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在构造他们的理论时，不得不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这一点在齐美尔对货币的社会分析中，在韦伯对社会分层的论述中，在帕累托对阶级斗争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然而，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他们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接受，实际上是通过对这些观点的歪曲来诋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他们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但他们把这一观点歪曲为不承认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在接受经济对社会发展作用时，必须同时承认意识具有绝不低于经济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是多因的。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发展是多因的，所以否认在历史发展中存在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规律性，认为只存在“可能性”。在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上，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来划分阶级、阶层是有合理性的。但他们又认为，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不能只从经济来划分，甚至主要的不是从经济来划分。韦伯提出从社会地位和声望来划分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帕累托从权力来划分，把精英人物与群众的区别看作是最主要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正是通过这种多样化的阶级、阶层结构观点来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均源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一结论。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也不否认阶级斗争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他们把这种斗争等同于生物的“生存斗争”，认为它是“使种族得以存在并改良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⑩因此，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无阶级社会不过是一种“幻觉”。

以上六个方面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初步概括。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虽然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流派，但它却蕴含了几乎所有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想原则。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工业社会理论。都渊源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这一时期是西方社会学的形成时期，但它没能对这门学科的对象达成共识，没有形成一种能对社会学研究的经验资料来进行概括、综合、比较的统一理

论，这就导致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性质，除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主流理论以外，在其它年代里，西方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各种或大或小、影响不一的理论不断出现。在前面的概括分析中我们还指出，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都强调社会学应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强调社会学的经验性质，但是，社会学这一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学家又不能不思考一些宏观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的本质，社会与人的关系等等。这就使社会学面临一个比其它学科更突出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没能在方法论上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加上他们对社会学的学科对象看法不一，从而使后来的西方社会学家在理论探索上朝两个方向分化。一部分注重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结果使理论重新染上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难以操作化，比如帕森斯的一般行动体系分析。另一部分则注重理论的可操作性，热衷于发展所谓中层理论或小型理论，比如墨顿的“失范”分析，但这种理论对于社会研究缺乏整体综合的能力。这种现象表明，由于西方社会学家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因而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另外，这一时期形成的自然主义研究立场与反自然主义研究立场的对峙，对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基本上都是按这两大派系发展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等，坚持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立场；而符号互动理论、本土方法学、批判理论等则坚持了以韦伯为代表的反自然主义立场。不过，从理论的哲学前提来讲，两者都是唯心主义的，一个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前提，一个是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前提。最后，“价值中立”作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资产阶级学者以此来否认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党性原则，标榜其研究的客观性。但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事实上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与秩序的立场上来阐发其理论观点的，如何使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协调整合是他们共同的理论焦点，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正如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表白的，“正是社会系统整合的问题使社会学家结合在一起，……在当代的境况里，某个人不可能选择一个更为战略的焦点以贡献于社会学理论。”^⑩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认真地、客观地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理论发展特征，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线索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迪尔凯姆著 胡韦译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115、9、2、77、37、75页。

⑦ 帕累托 《普通社会学》第1卷 第16页

⑧ 腾尼斯 《社会学引论》第5页

⑨ 迪尔凯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3页

⑩ 引自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351页。

⑪ 引自《国外社会学》1933年第4期，第33页。